



《清明上河图》在东北解放区回到人民手中

□ 潘文曼

北宋画师张择端创作的《清明上河图》，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2020年，在紫禁城600岁生日之际，《清明上河图》在故宫博物院再次展出，吸引了中外无数观赏者前来赏鉴。面对行云流水般精美宏大的画面，人们深深陶醉于古老东方民族独特的艺术气质，犹如在品读一部流动的历史、聆听着一首优美的乐章。然而，这幅巨作能够在今天面世的背后有着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得益于20世纪40年代共产党人在东北解放区的文物保护和抢救工作。

辛亥革命后，清帝退位。末代皇帝溥仪将大量珍宝、古玩、字画运出故宫，藏于天津。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紧在中国东北建立傀儡政权，1932年，以溥仪为“执政”的伪满洲国在吉林长春成立，这些文物珍宝也随之被偷运至东北，藏匿于伪满皇宫后面的书画楼里，《清明上河图》便在其中。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后，溥仪仓皇奔逃，之后长春的伪满皇宫失火，大量古代珍玩文物遭到破坏和抢劫。这些散佚的国宝，在当时古玩界被称为“东北货”，十分有名，商贩们趋之若鹜，从中牟利，很多传世珍宝在这一时期通过黑市流落海外。《清明上河图》就处于这样的险境之中，幸运的是，此时一位名叫张克威的共产党人发现了这幅绝世珍宝。

张克威，1901年生于吉林省吉林市，自幼受过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20多岁时他怀着“科学救国”的愿望赴美国留学十年，先后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农学院通用农学专业、芝加哥大学畜产品加工制造学院学习，成为一名出色的农业研究与管理工作。面对祖国山河破碎，张克威毅然放弃了在美国优渥的工作待遇和舒适

的生活条件，于1931年回到了东北，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抗日救国运动中。在此期间，张克威深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于1936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为党工作中，张克威深刻感受科学救国的愿望在国破家亡的严峻形势下是行不通的，于是他选择投笔从戎，从一位农业科学家迅速成长成为一名优秀的革命战士。1938年他受党组织派遣到革命圣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并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1940年，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成立，张克威当选边区政府委员。此时，日本侵略者加紧对边区的“扫荡”和经济掠夺，抗日根据地进入极为困难的时期。为了坚持抗战，边区搞起了大生产运动，张克威利用所学，引种良种，取得畜牧业大丰收，使部队装备和战斗力得到提高，受到了邓小平的表扬。

抗日战争胜利后，东北光复，张克威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担任长春警备区司令部参谋长。作为一名具有深厚传统文化素养的高级知识分子，看到祖国珍宝古玩字画被如此践踏，且时刻面临流失海外的风险，张克威十分痛心，思考着如何能够尽力收集并保护这些散佚的文物。然而，由于当时东北的行政管理权归属国民政府。因此，张克威无法以官方身份处置这些失散文物，只能想尽办法以个人名义在相关人士手中收购，同时发动身边战友在执行任务中如果缴获到相关文物务必交于他保管。就这样，张克威费尽心苦收集了十几卷古代名画，其中就包括《清明上河图》。他如获至宝，将这些画卷藏于家中，并严格交代妻子子女，这些并非人物物品，而是人民的宝物，任何人不许动、不许看。张克威的爱人金秉同他

一起精心保管《清明上河图》，却从未得一见。

解放战争初期，创建东北根据地困难重重，1946年5月，东北民主联军先后撤出四平、长春，退往吉林东部地区。张克威在跟随部队不断辗转转移之际，一直随身携带并全力保护着这些文物字画。直到吉林省政府即将从吉林市撤离的时候，为了安全起见，张克威决定将书画托付于一位老成持重、可以信赖的好友张宪武。张宪武不负所托，在自家财物遭到抢劫的情况之下，仍奋力护佑这些文物未受丝毫损失。经过一年多的艰苦防御作战，东北解放战争逐渐转入战略反攻阶段，国民党军在东北开始走向溃败。1948年4月末，张克威在完成抢修吉林丰满水电站任务后，专程前往张家找回两年前他所托物品，看到书画完好如初，十分欣慰。

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张克威于1948年5月调到设在哈尔滨的东北行政委员会工作。不久，中共中央东北局领导筹备成立了东北文物保管委员会，专门负责抢救、收集和整理在战争中失散的国家文物图书等工作。张克威立刻把苦心保护的十几幅字画交给了东北文物保管委员会。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林枫对这些从伪满皇宫中流出的文物很重视，责成相关人员继续寻找收集这方面的字画文物。在这些传世的精品画作中，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成为最有价值的巨作。

在艰苦的革命斗争环境里，中国共产党丝毫没有忽视文物保护工作，着力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抢救性保护，并重视传播文物价值，推动文物活化利用。1948年11月，东北全境解放后，随着东北大区机关陆续迁到沈阳，在战争中发现和找到的文物也都从东北各地运抵沈阳。1949年7月7

日，东北博物馆建立，这座博物馆当时收藏了数目众多的古代文物，很多都称得上国宝级，其中就包括张克威上交的《清明上河图》。1959年新中国迎来十周年大庆，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的决定，《清明上河图》等四件国宝正式拨交给北京故宫博物院，至此，这幅画又回到了紫禁城，回到了全国人民手中。

1948年5月8日的《东北日报》曾发表《东北文管会收到大批珍贵文物》一文，充分肯定了张克威等人保护文物之举，文中称之为“关系学术至巨，价值尤为重大”。1987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忆林枫》一书中辑录了原东北文管会常委王修的回忆文章《关心东北文物工作》，文中对张克威上交的这批古代书画的时间地点、名称数量、来历来源及收藏价值等都有详细叙述。2009年，辽宁省在纪念清官散佚书画国宝入藏辽宁省博物馆（原东北博物馆）60周年活动中，对包括张克威在内的老一辈革命者所作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并颁发纪念证书。

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文化的传承需要弦歌不辍，薪火相传。《清明上河图》在共产党人的保护下得以完好无损地回到人民手中，东北局保护国家文物珍宝的举措，留下了一段历史佳话，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无比珍视和伟大担当。

红色记忆

郑板桥的善良与达观

□ 潘 雨



郑燮，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生于1693年，卒于1765年，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客居扬州，以卖画为生，为“扬州八怪”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其诗、书、画世称“三绝”。民间传说中的郑板桥，多是特立独行、桀骜不驯、洒脱不羁的“怪才”形象。而事实上，无论是在从事艺术创作，还是为官做事、处世交友中，郑板桥还展示出他的另一面——善良与达观的品质。

以善处世。善待家人和族人，郑板桥在《范县署中寄舍弟墨》信中嘱咐自家兄弟要“敦宗族，睦亲姻，念故交”，“汝侍俸钱南归，可挨家比户逐一散给……无父无母孤儿，村中人最能欺负，宜访求而慰问之”，体现了他重视“众人之富贵福泽”的观念。还要善待他人，不能过于自私自利，郑板桥认为精明反不如糊涂。他说：“试看世间会打算的，何曾打算得别人一点，直是算尽自家耳！”郑板桥在潍县官廨曾题有一幅横额：“吃亏是福”。郑板桥相信，“天道福善祸淫，彼善而富贵，尔淫而贫贱”。此外，他积极行善，出门总是带着钱或果食，发现别人有了困难，就慷慨解囊。郑板桥在退官归里之时，把积存的薪俸全部分给了当地老百姓。《扬州府志》记载：“燮生有奇才，性旷达，不拘小节，于民事纤悉必周。”可见生性旷达的郑板桥，对老百姓很是善待和关照。

不恃才傲物。郑板桥虽然很有才华，但他在诗词书画创作上非常谦虚，“从不借诸人以为名”。在《书屏风赠织文世兄》一文中，他检讨自己说“自写其诗词，无知自大，真有愧古人”。同时，郑板桥也善于尊重他

人，赞扬他人。比如说，他欣赏同乡画家李复堂，赞其“笔精墨渺”；赞美岱丁年画作“合南北之灵秀，萃集一身”，自己甘拜下风。而对于明代著名才子徐渭（号青藤老人），郑板桥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甚至“尝刻一印云‘徐青藤门下走狗郑燮’”。对于好作品他敬而爱之，甚至屈尊求人。这样的纯真率性的品格，自然能够吸引到志同道合的朋友。

谦逊不与入争。郑板桥在《刘柳村册子》中这样自述过：“板桥最穷最苦，貌又寝陋，故长不合于时；然发愤自雄，不与入争，而自以心竞。”他得了功名，却只是自言“侥幸”。当官以后，仍称自己是“俗吏”。郑板桥在范县和潍县有政声、有政绩，但他仍

感自己做得不够，说自己无功于国、无德于民，非常愧疚。郑板桥罢官归里后，在前辈或乡贤面前都是晚辈、弟子口吻。

广交朋友、真诚待友。郑板桥交游很广，朋友也很多，被他写进诗词的僧人就近二十个。郑板桥不势利，朋友中有许多穷困文人，如在京应考“博学鸿词科”时，郑板桥考中了，而与他一起赶考的胡天游未中，郑板桥对胡天游的才华由衷敬佩，后来二人互文诗词，成为好友。再如图牧山是个闲逸文人，郑板桥与之也成为朋友，并写诗《赠图牧山》《又赠牧山》送他。还有郑板桥在北京结识的一位朋友音布，郑板桥对他的书法十分尊崇，题有四十八句长诗《音布》赞

他。郑板桥与一些民间艺人、落拓书生如竹雕艺人潘桐冈、盲艺人陈孟周等也是挚友。郑板桥与“八怪”中的其他人也有着较深的交往，他们经常相聚一起，纵谈天下，切磋诗文，研究技艺。

至今，苏州一带仍流传着一则关于郑板桥拒画梅花的故事。郑板桥辞官后，曾在苏州城的桃花巷东头开了一家画寓，以卖画为生。当时在桃花巷的西头，画家吕子敬也开了一家画寓。吕子敬是个落魄才子，身患多病，还要供养爹娘和老婆孩子，靠卖画养家糊口，生活颇为艰难。吕子敬擅长画梅花，并标榜自己画的梅花是“远看花影动，近闻有花香”。郑板桥来到苏州后，有很多人出高价请他画梅花，郑板桥总是婉拒说：我画的梅花比吕先生差远了。时间一长，吕子敬就觉得他的画比郑板桥的强多了，于是时不时地自我夸耀一番。郑板桥在苏州卖画三年后，要搬到扬州去。临行前，吕子敬前来送行。郑板桥便展纸挥笔，画了一幅颇有“触目横斜千万朵，赏心只有两三枝”意境的梅花图赠送给吕子敬。吕子敬见状十分惊讶，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郑板桥拒画梅花，为的是给自己留碗饭吃。从可见郑板桥的交友之道及人品。



临县、兴县、柳林、离石……这些山西的地方离我陕西的老家只不过隔了一条黄河，都不算远，是儿时老家长途汽车站牌上熟悉的地名记忆；地雷战、牺盟会、山药蛋派、吕梁英雄传……则是长大后阅读红色文学带来的深刻印象，但是，一直无缘亲历。终于，在今年的深秋时节，我和同事们跨过黄河，踏上了吕梁这片红色的土地。短短两日行程，却收获很多，内心深处总是被一些故事与见闻感动着。

吕梁位于晋西北，黄河以东，因吕梁山脉而得名。吕梁真正为我们所熟知的，是抗战时期国家危亡时刻，吕梁儿女投身抗战、奋勇抵御日寇入侵的事迹。这次前来，除了从前知晓的艰苦卓绝反扫荡、大批民众参与运伤员、保物资，老百姓造地雷“挤敌人”的英雄事迹外，又新了解到吕梁的不少红色故事，同样让我们感动和钦佩。

我们第一站落脚点是吕梁腹地——临县。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八路军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在党的领导下，吕梁军民与八路军并肩奋勇战斗，先后创建了晋西北、晋西南、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后来组建了跨越山西、内蒙古的晋绥边区，成为守护在延安的党中央的前沿阵地。从晋西北根据地到晋绥边区，不仅在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解放战争时期仍然贡献卓著。1947年，毛泽东转战陕北之时，叶剑英、杨尚昆等率领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时称“中央后委”）就驻扎在晋西北地区（临县、兴县一带），机关部队三千多人，分散居住在湫水河沿岸临县、兴县的四十多个村庄。

在临县，我们看到很多中央后委驻地的旧址，叶剑英、杨尚昆等住在双塔村；由谢觉哉、陈瑾昆等组成的中共中央法律问题的研究委员会，在距县城十多里的后甘泉村办公和生活。后甘泉村，因村下有一眼甘泉而得名，我们去的时候，仍然是泉水汨汨，手掬尝之，果然是甘冽清甜，据说此泉清而微温，入冬不结冰，令人称奇。从泉水口向山上走不远，就到了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曾经办公的窑院，一排四孔窑洞，背通向防空洞，前边是不大的院子，屋檐、门窗以及院墙都已残破，但大体还保持了历史建筑的原貌。

谢老当时年事已高，后甘泉村居住条件很艰苦，但他始终通达乐观，和村民们相处融洽，当他听闻后甘泉村人郭维昌英勇抗敌壮烈牺牲的事迹，特意为其撰写了碑文，称“骨是忠的，土是香的，香土埋忠骨”。了解到后甘泉村年节民俗后，他还写下“元宵村民打铁花，窑山火树寂无哗”的诗句。当地的村干部告诉我们，这个村正是以打铁花而远近闻名的。此外，这些年村里几乎家家户户制作烟花爆竹，供应省内外市场，如今形成了规模不小的产业。

离开临县，沿着湫水河一路向北，我们继续向兴县进发。兴县的蔡家崖村，是晋西北行政公署、晋绥军区司令部所在地，贺龙、续范亭等曾在此办公。我们参观了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晋绥军区司令部旧址，通过一件件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图片和文字、数据资料，了解到晋绥边区的发展历史和当时晋绥军民在党的领导下革命斗争生活。

1940年，晋西北遭遇大旱，庄稼歉收。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停发八路军军饷，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再加上日寇不断扫荡，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当地百姓生活陷入极大的困难之中，平时被作为马料的黑豆，成为人们仅有的食物，且黑豆都难以充足保障，很多人患上了夜盲症、肠胃病等。严寒时节，衣物匮乏，很多百姓因没有过冬的棉衣、鞋袜冻伤了手脚。

部队的生活尤其艰苦，粮食得

红色土地 吕梁行

□ 韩伟



不到保障，战士们经常忍饥挨饿，坚持与敌人周旋战斗。像搪瓷盆这样的生活用具，一个女兵班才有一个，通常是早上当洗脸盆，吃饭时盛饭用。武器更是缺乏，很多队伍不仅步枪不能按人配发，即便是大刀、红缨枪，也是几个人共用的。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干部战士保持着昂扬的斗志，不断地在对敌斗争中取得胜利。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边区军民的生活也逐渐好转，但边区经济仍算不上富足。在解放战争时期，晋绥边区将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八十上交给党中央。1948年9月，西北战事正酣，贺龙等接到中央军委指示，要求二十天内动员两万石细粮，集中新兵五千到一万参加野战军，结果仅三天时间，就筹集细粮一万石，新兵一万人，还有棉衣等物资，而这其中“兵员补充，粮食弹药都靠晋绥”。

在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我们还意外地了解到成成中学师生的抗战传奇，它与吕梁这片红色热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一支特殊的抗战队伍，由一群爱国师生组成。1938年，日寇铁蹄踏破华北，在国家危亡的紧要关头，太原成成中学，从老校长，到年轻的师生，五十余人毅然投笔从戎，在清源县组成抗日游击队，转战晋西北。当年他们就是从临县、兴县出发，跟随八路军大青山支队挺进绥远大青山，创建抗日根据地，最终血洒塞外，很多牺牲的年轻人仅有十八九岁。成成中学校友、抗日游击队队员阎百真在《成成烽火》一书中写道：“许多成中师生，以他们风华正茂的最佳年龄，光荣殉国，鲜血洒染了塞外草原，忠骨埋在大青山上。”师生们勇毅无畏的抗战故事，令我们肃然起敬。

短短两天时间过去了，在微微细雨中，我们踏上了返程，感觉收获满满。纪念馆和革命旧址中那些生动鲜活画面不断在我的脑海中萦绕，从前听闻的吕梁抗战故事经此亲历更加令人震撼，而那些曾经在书中读过的吕梁英雄人物则更为生动立体，他们的生命在历史中远去，但他们的精神却在人们的心中永存。



晋西北行政公署旧址